



## 中国特色体育话语的生成逻辑、实践进路、解释框架 与新时代的使命

刘亮<sup>1,2\*</sup>, 吕万刚<sup>1</sup>, 沈克印<sup>1,2</sup>

(1. 武汉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体育全球化所带来的负和博弈风险是西方体育话语“单一化”主导的结果,而中国的“和”文化具有调适这一风险的天然优势。从必然性角度剖析了“身体国家化的隐喻”这一中国体育话语的生成逻辑,指出体育的生成虽与国家的关联并非天然,但中国体育促进国家的重构却是必然。进而从“本土化”与“全球化”两个向度,对中国体育话语双向构建与嬗变历程进行了考察。基于以上分析,将构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世界体育共同体并以此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体育话语体系的特色与优势。从思想性话语、制度性话语和理论性话语3个层次提出了中国特色体育话语建构的解释框架。据此框架,从打造象征性话语权——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理念,提高结构性话语权——积极推动国际体育治理实践的深度参与,增强学术性话语权——不断坚定中国体育理论话语的学术自觉3个方面对新时代的应然路径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特色体育话语;思想性话语;制度性话语;理论性话语;国际体育治理。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现代体育在中国走过了逾百年历程,如果从这百年的经济社会文化场景中进行宏观考查,体育曾两次作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叙事登上历史舞台:一是20世纪初期现代体育话语的引入推动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国家建构;二是21世纪初期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话语输出,塑造了国家新形象。从现代体育带着西方的话语走入中国,到现代体育带着中国的话语走向世界,两个宏大叙事的背后是现代体育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历程。

在这一过程中,世界体育因为中国元素的注入而变得丰富多彩。一方面,中国竞技水平提升促进了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普及,中国资本的介入激发了全球体育产业活力,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丰富了世界体育发展模式,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育治理保障了体育在全球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欧美国家一直是控制世界体坛的主导力量,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中国体育发展优势尚未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体育对世界体育的贡献也并未获得相对等的话语地位。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设。”可见,根据这一新时代的纲领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话语体系,把体育打造成为展示国家形象、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效载体,进而为世界体育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更加重要。

### 1 和而不同共繁荣:体育全球化带来的负和博弈风险与文化调适

从德国体育史学家卡尔迪姆认为体育是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到法国社会文化研究学者维加雷洛认为体育起源于19世纪欧洲贵族的休闲游戏(Vigarello, 2002),虽然学者们对现代体育的生成尚存争议,但现代体育的发展一直由西方文化所主导却是无可置疑。多年来,以体育项目扩散和国际体育赛事为主要表征的体育全球化的确促进了世界体育文化的繁荣,但也不可否认,由西方话语主导的体育全球化,实则隐喻着“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单一化取向。这不仅“扼杀了本来就不多的本土体育文化的生

收稿日期:2019-01-18; 修订日期:2019-08-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TY026)。

\*通信作者简介:刘亮(1980-),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E-mail:117226388@qq.com。

存空间”(Donnelly, 1995),更为关键的是,这种以“竞争”、“征服”所带来的异化现象,也使国际体育界的零和、负和博弈的风险不断增大,正在侵蚀着国际体育治理平台的根基,如此下去必将引发其合法性危机,谁将受损自不待言。

面对现代体育因不断异化而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体育组织从组织变革、项目调整到规则创新、法治建设等层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由于未触及问题的内核和形成逻辑,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体育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张晓义, 2016),那么它是否就意味着一定是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单一化”?如果有一种文化能够调适利益矛盾和价值冲突所带来的负和博弈风险,而中国又可提供实现这种调适的话语支持,那么我们要不要有所担当?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的“和”文化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实践范例,已为打造世界体育共同体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一,现代体育作为西方社会的产物,其背景因素是无法移植到中国的,而中国体育实践的复杂性也远超出西方体育话语解释的空间。因此,这就有必要在西方体育话语的基础上补充一个由中国体育话语来充盈的智性表达,从而提高世界体育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其二,如果从体育全球化的最初目标来看,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包容和理解正是顾拜旦建立现代奥林匹克的目的之一。文化因多样而精彩,智慧因交流而共赢。不同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国信奉的是“和而不同”,提倡的是“多元共生”,追求的是“美美与共”,这种中国文化独具的包容性特征,有着应对价值理念冲突的天然优势,也为促进世界体育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可行性。

## 2 身体国家化的隐喻:中国体育话语生成逻辑的必然性探析

### 2.1 体育的生成与国家的关联并非天然

虽然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眼中,体育早已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Bourdieu, 1978),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现代体育的生成逻辑却与国家需要并无直接关联。而根据古特曼的解释,体育是一种非功利的、有组织的身體竞赛,它源于理想主义者的共同追求和人类身体力量的自然表达(Guttman, 1979),其本质是一种超越国家、民族、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跨文化存在,也是一种人性深处原始思维和本能性需要的普遍性存在。既然现代体育具有这种超越性和普遍性的特质,也就意味着其产生与国家之间并无必然关联(固然古罗马角斗竞技是基于军事意义,但是否属体育范畴却有争议)。也正如学者袁旦教授所言,“西方现代体育的成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国家或政府的,是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民众生活中自发

地自下而上成长和发展的产物……它终于彻底地摆脱了依附于社会生活中其他活动而存在的状态,成为一种独立的实践登上了人类社会生活舞台”(袁旦, 2012),也进一步印证了最初体育的产生独立于国家需要的观点。必须指出的是,体育虽然根源于人的本能生活,但它所采取的运作机制却是现代社会赋予的,必然受其他社会性力量的影响和制约,故也会隐含一定的意识形态因素。

### 2.2 中国体育促进国家的重构却是必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强国强种”成为一种集体认同。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新政,清政府尝试以一系列改革来因应民族危机,但均以失败告终。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身体的改造被提升到国家建构层面就成了一种历史必然选择。面对改革失败后的困顿局面,社会精英不约而同地采用对“身体”的再造来喻说“国事”,由此,“身体成为民族国家想象的载体,为现代体育的传入和话语的开启埋下了伏笔”(邵晓军, 2013)。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先有新身体,再有新国民,才有新国家”逐渐上升为晚清先进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自觉,身体改造承载着国民素质提高的新期待被放置于逻辑起点。

与此相契合,现代体育带着西方的世界观和身体规划技术传入中国。由于我们能从其话语形式中获得社会革新和国家建构的动力,借鉴现代体育这一西方话语系统寻求问题解决之道就成了必然选择。为实现救亡图存,国人对体育寄予了特殊的情感,这让“现代体育话语的生成在起点上就被赋予了国家化的面向,并归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场域中”(邵晓军, 2013)。随之,身体再造作为国家重建的想象和隐喻被上升为行动的纲领,“强国保种”也相应成为现代体育话语表达的应然逻辑,这便构成了中国体育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起点。

## 3 本土化与全球化:中国体育话语双向构建的实然性考察

在全球化语境的发展背景下,现代体育既有独语形态又有对话形态,这两种形态作为不可省略的必然客观事实呈现,构成了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与之相对应,中国体育话语建构也呈现出两条并行主线:一是对内话语的构建,着眼于促进内部认同,凝聚体育价值共识,推动体育参与和提升体育国内地位,提高国民素质;二是对外话语的构建,着眼于促进外部认同,提升中国参与国际体育治理中的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

### 3.1 本土化——对内话语的嬗变

虽然中国体育现象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祭祀和狩猎活动,但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普通民众对体育的认同度较低。因此,效仿、移植西方话语形式并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进行消化与吸收,以回答“有何用”“何以用”

的问题,就成了体育对内话语生成与建构的基本逻辑。

1)“强国体育”话语的生成与转义。不同于西方体育“自下而上”地成长于资本主义的民众生活中,中国体育作为“舶来品”是由社会精英引入和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发展的,实现救亡图存、促进国家建构是其最初的基本使命。因此,无论是晚清推行“强国强种”“军国民体育”所体现的“中体西用”话语内核,还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育实践活动所蕴含的红色体育话语基因,抑或是新中国成立后“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目标,根据国家建构的需要设定体育目标”(任海,2018),发展国家生产力、国防力和彰显国家主权成为体育话语建构的主要基点。虽然“强国体育”话语生成与建构更多地体现的是工具理性,但作为“东亚病夫情结”话语的现代转义,由于其成功唤起了民族国家意识,酝酿了国家建构的力量,彰显了制度优越性,也反映了话语的凝聚力、解释力和象征力。

2)基于“强民体育”的话语建构。改革开放让中国迅速崛起,体育也实现了飞跃式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育话语主题和焦点开始重视大众的世俗生活场域。根据学者任海教授的观点,重在国族建构的“强民体育”包括两个层面:国族一体化和国民现代化。一方面,“体育本质的人文属性与国族建构的社会文化属性高度一致”(任海,2018)5;另一方面,体育是实现国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侧重彰显价值理性的“强民体育”话语逐渐兴起并成为体育话语建设的主轴。一时间,以“全民健身”“健康工作50年”“增强体质”为关键词的话语生产成为官方、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而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到来,“媒体对奥运会的报道也开始集中在它的竞技精神上”(Brownell,1995),被学者视为“现代体育进入中国一个世纪后竞技精神终于接上地气”(梁雍茜,2012)。这表明中国从“强国体育”话语到“强民体育”话语的本土化建构被赋予了实质性内容,同时也提升了话语的吸引力。

3)“生活体育”话语的兴起。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这不仅擘画出新时代“生活体育”的美好图景,而且所催生的反映国民幸福指数的体育生活文化,正在引领并支撑体育的深层次改革。从政策话语层面看,从2014年国务院“46号文件”出台,到201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以及2019年《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2019—2020年)》的公布,政府已经将体育纳入到生活性服务业,奠定了“生活体育”的政策基础。从社会话语层面看,随着人民生活需求不断升级和多元,“没有全民健身就没有全面小康”的观念深入人心,逐年升温的“体育健身热”让体育变成一种生活“刚需”,这成为“生活体育”话语价值的生动诠释。从学术话语层面

看,“生活体育”开始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和理论界的重要课题,对其本质、内涵等研究的理论话语生产不断得到扩展和沉淀。显然,“生活体育”作为人民对体育权利的内在诉求,以及党和国家对这一诉求的回应,已经成为新时代体育话语生成的主要逻辑特征。

### 3.2 全球化——对外话语的转型

现代体育是世界都能看懂的“肢体语言”,而奥运会作为现代体育精神和价值的超越性体现,“有着国际通行的技术标准、竞赛规则和运作程序”(钟秉枢等,2018)。要想取得在场参与、交流与对话的资格,就必须与世界体育体系实现“话语匹配”。因此,在与全球化的互动中实现外部认同,就成为中国体育话语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向度。而且,这一过程是随着国家体育实力的增长和自身发展定位的调整而不断拓展与转型的。

1)从排斥到接纳。最初,由于缺乏对现代体育话语的深入理解以及竞技实力不强等原因,中国刚开始曾出现过“土洋之争”。在“强国强种”的体育实用价值话语影响下,并随着对西方体育话语内涵的了解与认识,中国逐步融入到国际体育事务中,并开始争取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在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中国追求融入世界体育话语体系的脚步从未停止;从3次承办亚运会到2次承办奥运会,中国已成为国际体育赛事的重要举办地,“仅2009—2017年就有204个国家和地区5万多人次的运动员来我国参加大型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钟秉枢等,2018),为国际体育交往提供了有力平台;从引进海外兵团到进军国际体育人才市场,体育人才的输出与引进已成为常态,近10年“已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双边体育交流”(钟秉枢等,2018),中国体育也开始全面走向世界。

2)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中国参与国际体育治理体系是国家体育实力、国际责任和话语能力的显著体现。一方面,国际体育参与扩大了中国体育及综合国力的影响,在“与世界体育的互动中架起了政治外交之间的桥梁……对我国公共外交、人文外交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钟秉枢,2018)。当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职人数稳定在254-275人之间”(钟秉枢等,2018),中国正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国际体育事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为国际体育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如著名的“乒乓外交”就以“小球转动大球”轰动了国际舆论;20世纪60年代主导发起的新兴力量运动会,“客观上推动了国际体坛民主化改革进程”(熊晓正等,2010);开创处理中国台湾问题的“奥运模式”尽显了中国智慧。如果说“一个国家接受和引进现代体育的能力本身就是该国家工业发展的一个指数”(Guttman,1979),那么一个国家在国际体育发展中的贡献度就是该国综合实力的标志。为了提高这种贡献度并扩大和延伸

体育话语体系,中国曾以援建、赠送体育器械、选派优秀教练员、接待体育代表团来华培训等方式,向亚非拉等7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熊晓正等,2010),为世界体育发展贡献了优质资源。

诚如学者所言,“一部世界近现代体育史,实际就是东西方体育互拒互斥、互渗互融的历史”(易剑东,2006)。伴随着“土洋体育之争”,中国体育在对内和对外两个向度的话语实践中走向世界舞台,而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话语体系也渐呈水到渠成之势。

#### 4 超越西方中心论:中国体育话语体系“特色”的本然性阐释

##### 4.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体育话语的特色与优势

在现有世界体育格局下构建中国体育话语体系,必须把握好“国际社会的研究兴趣点、利益交汇点、议题聚焦点、情感共鸣点”(卫庶,2018),从中找到构建世界体育共同体给各国所能带来的福祉和希望。从文明发展角度来看,体育作为世界通用的语言、智慧的结晶、文化的积累和共同的财富,与人类发展相辅相成。为之,国际奥委会曾于2013年6月推出“奥林匹克主义在行动——体育服务全人类”的宏大工程,这意味着体育发展的未来愿景与人类命运密不可分。而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既承认全球多元价值的存在,又“超越了传统狭隘的民族国家概念和意识形态分歧,摒弃了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迥异于西方个体本位的思维方式”(姚乐,2018),为世界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和智慧贡献。也正是由于“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与发展的趋势,完全符合习近平文明思想体系中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2018)。因此,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指导国际体育治理实践,用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包容”精神来处理国际体育争端,用“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精神开创国际体育治理的新格局,构建多元平等共享的世界体育共同体,从而超越西方话语体系的“一元化”和“强制性”逻辑,以此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就成为构建中国体育话语体系最大的特色和优势。

##### 4.2 中国体育话语体系创新的解释框架

就体育的特性和结构而言,中国体育话语体系无论是被国外还是被国内理解和接受的过程必然是分层次、分阶段的。根据话语建构的基本规律和当前国家体育事业的构成要素,相应地,中国体育话语体系可分为思想性话语(核心层)、制度性话语(保障层)和理论性话语(基础层)3个层次(图1)。

1) 思想性话语。话语体系核心层的范畴、表述和话语逻辑反映的是中国体育发展思想内容。“话语的背后是

思想”(韩庆祥等,2017),思想性话语作为一种象征性权力,虽不具备强制性,却是无处不在的观念权力和软性力量,能够改变人的观念,成为话语体系的核心与灵魂。如前所述,在实践中由于现代体育的形成及扩散带有国家主义的性格,每个国家体育制度也是在特定体育思想观念的引导与推动下运行的,其中必然蕴含着本国的文化基因。因此,外生的“灵魂”如果不适应本土体育现实,不仅难以真正成为体育实践的推动力,相反还容易形成发展的障碍。而且,思想性话语具有时代性特征,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体育发展主题,也必然有特定的思想指向。

2) 制度性话语。话语体系保障层反映的是中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表达权、参与权和主导权。制度性话语是一个国家或组织在起草、制定国际“游戏规则”中的发言权、决定权(周倩,2016)。由于国际奥委会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形成了纵向分割的结构权力,不同主体的权力与组织结构中的位置相对应。在这种治理框架下,各种标准、规则、规范的制定,议题的设置,资源和权限的分配以及各类委托和授权,其过程均交织着竞争与合作,充满着国家间体育实力的较量,关系着国家的合法权利。作为一种用制度形式固化的话语权,它是实现国际体育事务深度参与的保障和具体体现,也是塑造中国体育话语国际认同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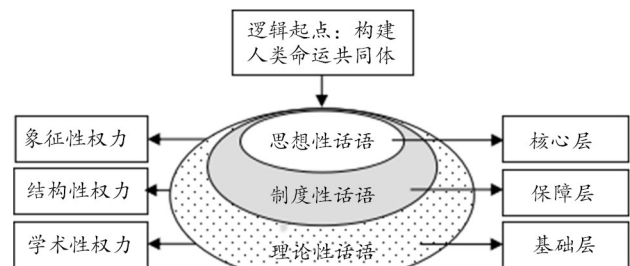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特色体育话语体系解释框架

Figure 1. Th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Sports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 理论性话语。话语体系基础层反映的是以中国体育发展理念为指导的体育理论体系。任何话语体系都有其核心理论的支撑,作为一种学术性权力,体育理论性话语是对体育本质和规律的系统解释,既来自于学术共同体深入系统的理论建构、学科建设和学术探索,又与丰富的体育实践和社会互动密切相关。按照福柯的观点,“由于知识的政治性,所有的基本术语和问题都具有高度价值倾向”(杨海庆,2016),而体育话语作为表达体育思想观念的字词、句式,就成为体育理论的外化和特定意识形态的表达,也决定了体育话语体系也必然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和理论立场。

在以上构成要素中,体育思想是体育话语的制高点,体育话语是体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制度是权力的保障,体

育制度性话语既来源于国际体育事务的深度参与,又与国内体育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理论是思想的工具,理论性话语既是特定思想的系统性阐释,又产生于生动的体育实践之中。

## 5 新时代的使命:中国特色体育话语体系建构的应然性思考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尚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难题的破解需要做出全面的实践支撑、理论准备和话语回应。因此,根据上文提出的解释框架,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话语体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 5.1 打造象征性话语权——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理念

“思想是话语的内容和本质”(林伯海等,2018),任何话语体系都有其政治立场和核心思想的支撑,“近代欧洲体育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其背后的思想动力”(杨海庆,2016)。而反观现实,“中国体育完全没有超脱实用的界限,……是其最大的思想局限”(金光辉,2012)。面对缺乏民族文化底蕴和本土思想支撑的体育,有学者不禁担忧会让整个中国体育思想史“既缺乏西方体育中与文艺复兴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也截断了中华文明优秀文化的传承”(石龙等,2009)。而确定和选择一种体育发展思想并不难,难的是用它指导真实的体育实践并能引起共鸣。因此,创新新时代中国体育思想话语,应坚持国际与国内两个面向并深入回答以下两个基本价值问题:

1)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世界各国体育发展样式不同,但对体育的现实意义和未来走向的理解逐渐趋同:从体育最初作为神圣的宗教祭祀,到中世纪体育仅为封建贵族利益服务;从体育成为普通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到国际奥委会在《奥林匹克宪章》中提出“从事体育运动是人的权利”,再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强调体育“为人类发展服务”,体育正“转向全人类发展的根本需要”(胡小明,2000)。而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会将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和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汇聚到一起,成为现代人类最具共享的文明财富。无论是从科学世界观的理性精神审视,还是从回归生活世界的现代哲学来看,体育作为“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性化”文化(Guttman, 1979),都能让全人类加深对“命运共同体”这一独特理念的深刻理解,必将成为“照亮人类命运共同体前景的燭火之光”(万俊人,2016)。如果说“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回答了国内体育发展的价值定位问题,那么这一价值的向外延伸就注定体育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密不可分。因此,要让这种体育思想形成话语影响力,必须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筑起由中国体育

精神、中国体育价值体系和中国体育体制等构成的体育发展格局。

2)要坚持以人民满意为尺度的价值标准。从国内范围来看,体育改革与发展要想在国内争取更大的话语权,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必须从发展体育的逻辑和终极目的中寻找答案。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人民就成了体育发展的主体和受益的客体。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略。因此,体育只有将人民诉求作为改革的目的,把人民意志作为改革的动力,以人民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判标准,才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也就是对体育话语权的真正诠释。应该认识到,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东方大国发展体育,不论国外经验能提供多么重要的参照,其大都是欧美“在场性”的思想体系,离开了其生发背景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悬置性独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理论思想产生于社会实践。由全体人民所组成的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才最能生动地诠释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终极奥义,这也为提炼出最接地气的理论思想提供了“源头活水”。因此,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思想,坚持体育的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将汇聚起体育发展的磅礴力量。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在国际体育中的话语权取决于国内体育发展现状,一个能为13亿人口带来实惠的体育发展模式,它所倡导的体育思想和理念、所构建的体育发展道路也必然会被国际社会认可和效仿。

### 5.2 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积极推动国际体育治理实践的深度参与

以国际体育组织为依托的国际体育事务合作平台,并非是全球性的行政管理架构,其本质是在共同规则规范下的国际体育事务专门性自治机制。虽然在这一平台中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独立地位的行为体,但由于在国际体育标准、规则、规范和条例等制定中的作用、参与次序和参与深度并不一致,因此国家间的制度性话语权并不对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要求,作为国际机制中影响力和决策权的保障,提高体育制度性话语权也就成为中国特色体育话语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

1)应理性分析提高中国体育制度性话语的机遇。作为与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体育的全球化推动了现代体育的快速发展,如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体育全球化的代表,已由1896年第1届的13个国家发展到2016年第31届的207个国家及地区。但由西方价值观主导的现代体育全球化也因不断异化和失范而产生了一系列伦理问题而面临新的突破,如权利异化背离了组织目标、治理不善引

致合法性危机、赛事争议与仲裁屡遭质疑、非法赌球愈演愈烈,以及“兴奋剂、球场暴力、科技依赖等现象将奥林匹克运动变成了西方工业化社会日常生活矛盾的窗口”(王润斌等,2011)。面对这些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根据党的十九大的战略部署,中国正在建设体育强国,而“强大的体育外交,强势的体育仲裁话语权,是一个体育强国必须具备的综合实力”(孙嘉晖等,2017)。因此,无论是从国际义务还是国内利益来考量,为以上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就成为一个大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2)应做好建设体育制度性话语的全面准备。国际体育事务管理并不是建立全球性的体育管理体系或行政管理架构,其实质是确立一个国际体育事务的协作合作处理规则。但由于各国在规则制定中的角色与地位不同,决定了国家间体育制度话语权的强弱也有所不同。有为才有位,体育制度话语权取决于国际体育事务的参与程度,“广度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深度体现在中国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层次等”(孙凯,2014)。因此,要根据国家的体育发展实力和价值追求,提升中国在国际体育事务中实质性参与的广度与深度,进而实现话语权利转变成话语权力。而实现由“话语权利”向“话语权力”过渡的飞跃,人是决定性因素,其改革措施应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一要结合国内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国人到国际体育组织任职松绑,争取更多的人员进入到国际体育组织的领导层和决策层;二要在政策上支持,从专业和课程设置、经费资助、就业服务、实践培训等方面重视国际体育组织人才的培养,并鼓励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人士去国际体育组织任职;三要从针对性和长远性出发,重视国际体育组织参与的策略研究,为提升话语影响力创造良好条件。

### 5.3 增强学术性话语权——不断坚定中国体育理论话语的学术自觉

体育学科体系和体育学术体系是体育理论话语生产的控制体系。多年来,为寻求体育实践中问题的解决之道,学术界曾参考、援引甚至直接套用了诸多西方的概念、判断、观点和表述。当然,国外理论的大量引入强化了中国体育学科的认识功能与诠释能力,大大扩充了体育话语的理论储备。然而,由于对外来理论“缺乏深入地理解与消化”以及穿透性地反思与评判,最终未能实现理论上的超越,故在解释中国体育现象和实践时有时略显“苍白无力”。为化解这种尴尬和困境,理论界应从以下两个层面发力:

1)应重建体育学的学科场域。目前,虽然体育学作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得到确立,显示了体育学科在国内地位不断上升,这也是体育理论话语建设成效的有力明证。但相比于同类和周边学科,体育学在国内的

地位依然未有实质性改观,如体育界学者未有参加院士竞逐资格等。对内话语权是对外话语权的基础,如果体育学在国内地位尚处于劣势地位,何谈在世界舞台上赢得国际话语权呢。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体育学科处于社会大系统的环境体系中,其知识生产、结构边界的生长和场域的扩张都是社会选择的结果,一开始就带有权力色彩。因此,提升体育的学术性话语权,就要通过策略重建学科场域以占有更多“资本”。其一,应加强基础理论创新。要厘清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体育基本概念、科学属性和元理论等基本理论问题,完善学理规范体系,打破体育知识生产的学科瓶颈;要结合实际形成理论话语生产机制,将丰富体育实践的“实践性”升华为“实践理性”;要以反思学术盲点促进原创性知识生产,为争夺学科话语权积累内部学术资本;其二,应借势为体育学升格增加外源性动力。当前社会各界对体育的关注前所未有的,应充分利用国家战略、社会需求等外部力量的形塑作用,争取更多的外部学术资本和政策资本;要积极应对同源学科的竞合、制衡、共生和互补关系,通过母学科的“体育化”与体育学的“母学科化”实现学术资本交换;其三,应积极提升体育学科的国际影响力。要积极与国外体育学术组织、学术团体建立联系,并承办、主办和参加国际体育学术会议,增进中国体育理论的国际传播力度和参与力度,增强与世界对话的能力。

2)应积极开展体育学术批评。真理越辩越明,理论研究离不开学术批评。作为一种纠错机制,批评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体育学学术批评严重缺失”(杨黎明,2004),仍是一片亟待填补的洼地。改革开放以来,体育理论研究空前繁荣,“1980年以体育为主题的文章约500篇,到2007年已达2.5万余篇,累计达20余万篇”(国家体育总局,2008),这显然是一种超常规式的发展。但面对这一巨量学术成果和知识积累,体育批评不应沉默和缺位,理论界应以一种高度的自觉意识,将开展理性的学术批评作为繁荣学术、提升理论品格的策略。其一,学术共同体要大力提倡宽松、开明的环境和氛围,鼓励学者开展理性交流,增强体育理论的深度、广度和触发性;其二,学术机构、学术组织要发挥协调和引导作用,通过发布学术批评类课题,开设学术批评论坛等方式,营造争鸣、对话的学术氛围和思想交流空间;其三,学术期刊要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设置专栏和学术议题等形式,搭建多维互动平台,引导学术批评推动研究向纵深发展;其四,学者自身要树立批判意识,既有自觉匡正的勇气,也要有虚怀若谷的气度。需要注意的是,学术批评不是一种学术检查,批评应源于学术也止于学术,避免恶意攻诘和刻意打压的现象。

## 6 结语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在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向前迈进。面对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艰难调适,面对现代体育“本土化”与民族体育“全球化”的复杂纠缠,面对中国国际形象从“东亚病夫”到“中国威胁论”或“中国机遇论”的转变,中国体育的自我定位、话语构建和叙述方式如何,都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但由于中国特色体育话语体系的构建涉及体育领域的方方面面,其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本文只是在理论层面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除此之外,还涉及话语平台、媒体宣传、外事交流、文化传播、人才队伍等诸多层面,囿于能力和精力所限,本文并未关涉,希望后续研究给予关注。

## 参考文献:

- 奥代德·勒文海姆,朱剑,2016.考核国家:国际“治理指数”的福柯式视角[J].探索,(4):153-160.
- 高鹏飞,2013.论“举国体制”场域演绎下的语言符号暴力[J].体育与科学,34(2):57-62.
- 高强,2014.论现代体育之“超越”品格:从身体整体论到身体个人主义[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40(1):28-33.
- 国家体育总局,2008.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体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 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2013.中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978—2010)[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 韩庆祥,陈远章,2017.建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N].光明日报,2017-5-16(15).
- 胡小明,2000.新世纪新体育[J].体育学刊,(5):1-7.
- 黄金麟,2006.历史、身体、国家 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北京:新星出版社.
- 金光辉,2012.从体育教科书和专著的立论基础看体育思想的演化[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梁雅茜,2012.现代体育与国民的身体塑造[J].文化纵横,(5):94-95.
- 林伯海,熊钰,2018.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现状观察与转换理路[J].高校辅导员,(1):22-25.
- 卢元镇,2001.竞技体育的强化、异化与软化[J].体育文史,(4):19-20.
- 任海,2018.体育强国:由重在国家建构到重在国族建构[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42(1):1-6,40.
- 邵晓军,赖雄麟,2013.晚清民族危机中现代体育话语的生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30(5):580-583.
- 石龙,狐鸣,2009.中国体育思想的跨世纪转变[J].体育与科学,30(3):8-11,19.

- 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2018.习近平的奥林匹克文化情怀与文明愿景[J].文明,(1):12-27.
- 孙嘉晖,王志标,2017.谁接过中国体育的国际话语权?[N].广州日报,2017-2-22(A7).
- 孙凯,2014.参与实践、话语互动与身份承认:理解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进程[J].世界经济与政治,(7):42-46,157.
- “提升我国体育文化软实力核心问题研究”课题组,2015.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及其提升[M].北京:科学出版社.
- 万俊人,2016.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烟火之光[N].光明日报,2016-8-5(1).
- 王润斌,杨麟,熊晓正,2011.奥林匹克主义的历史哲学审视:兼评迪卡娅·凯泽斯塔提乌的“当代奥林匹克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变迁”[J].体育科学,31(8):3-19.
- 卫庶,2018.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J].求是,(4):59-61.
- 熊晓正,钟秉枢,2010.新中国体育60年[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 杨海庆,2016.身体觉醒:17、18世纪欧洲体育发展思想动力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42(6):67-73.
- 杨黎明,2004.我国体育学学术批评的现状[J].体育学刊,11(6):10-13.
- 姚乐,2018.重塑国际话语,改革全球治理[EB/OL].[2018-03-06].<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mK6Rh7>.
- 易剑东,2006.体育文化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 袁旦,2012.时代呼唤人文体育价值观和工具理性体育价值观批判(2):从一本西方体育学著作说起[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7(1):1-10.
- 张晓义,2016.体育全球化:中国体育的态度与制度应对[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39(2):1-5.
- 钟秉枢,2018.从封闭到开放:对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互动的思考[J].体育科学,38(7):19-20.
- 钟秉枢,刘兰,张建会,2018.新时代中国体育外交新使命[J].体育学研究,1(2):37-44.
- 周倩,2016.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性话语权[N].人民日报,2016-5-3(7).
- GUTTMANN A, 1979. 从仪式到纪录:现代体育的本质[M].花勇民,钟小鑫,蔡乐芳,译.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 VIGARELLO G, 2002. 从古老的游戏到体育表演:一个神话的诞生[M].乔咪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DONNELLY P, 1995. Sport monoculture: Crisis or opportunity? [R]. Olympia: Int Olympic Academy Report.
- BOURDIEU P, 1978. Sport and Social Class [J]. Soc Sci Inform, (17):819-840.
- BROWNELL S, 1995.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he Generative Logic, Practical Approach,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and Mission of the New Era of Sports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U Liang<sup>1,2\*</sup>, LV Wangang<sup>1</sup>, SHEN Keyin<sup>1,2</sup>

1.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Sport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79, China

(下转第67页)

## Utility of EMG Indices in Evaluating Rectus Femoris Muscle Fatigue Induced by Intermittent Sprinting Cycling Exercise Based on Grey Association Analysis

WANG Lejun<sup>1\*</sup>, SHAO Qineng<sup>1</sup>, MA Guoqiang<sup>2</sup>, GONG Mingxin<sup>1</sup>, NIU Wenxin<sup>3</sup>, QIU Jun<sup>2</sup>, XU Yangcai<sup>4</sup>

1. Sport and Health Research Center,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Science Institute of Shanghai, Shanghai 200030, China; 3.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92, China; 4.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utility of EMG indices in assessing rectus femoris muscle fatigue induced by intermittent sprinting cycling exercise based on grey association analysis, therefore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method to evaluating muscle fatigue. Methods: Ten cyclists performed five intermittent exercise bouts with 6-second all-out cycling exercise protocol, a recovery phase with 24-second low intensity cycling was set between every two bouts. The power output, cadence and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sEMG) of the right rectus femoris muscle were measured. Combined with time-domain, fourier transform, wavelet packet transformation and nonlinear analysis method, the RMS, MF, MPF, MDF, MNF, C(n), FD (Fractal Dimension) and SE (Sample Entropy) of sEMG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power output and cadence were decreased progressively with the increase of cycling phase and time duration. The MNF and SE showed the same change tendency with power output and cadence. The grey association grade between SE and exercise performance (power output and cadenc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other sEMG indices, and the next parameter was the MNF. However, the FD parameter have the lowest correlation. Results: During intermittent sprinting cycling exercise, the rapid high intensity workload contraction with interval recovery will induce severe peripheral fatigue in rectus femoris muscle. The EMG indices of SE which is calculated based on nonlinear analysis is the optimal parameter in evaluating rectus femoris muscle fatigue induced by intermittent sprinting cycling exercise.

**Keywords:** sEMG; cycling exercise; intermittent sprint training; exercise-induced muscle fatigue

(上接第30页)

**Abstract:** The negative sum game risk brought by sports global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simplification" of western sports discourse, and the Chinese "Harmony" culture has the natural advantage of adjusting this risk.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necess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metaphor of body nationalization", which is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Chinese sports discourse, and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ation of sports and the state is not natural, it is inevitable that Chinese sports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Then,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loc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wo-way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ports discourse.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world sports community of "harmony but difference, beauty and common" and promotes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Chinese sports discourse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ree levels: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and theoretical discourse. Based on the above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proper path of sports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creating the symbolic right of speech—to focus on practicing the people-centered concept of sports development; 2) improving the structural right of speech—to actively promote the deep particip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governance; 3) strengthening the academic right of speech—to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consciousness of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of sports in China.

**Keywords:** characteristic sports discourse;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theoretical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sports governance